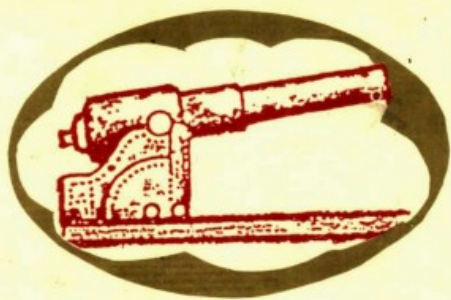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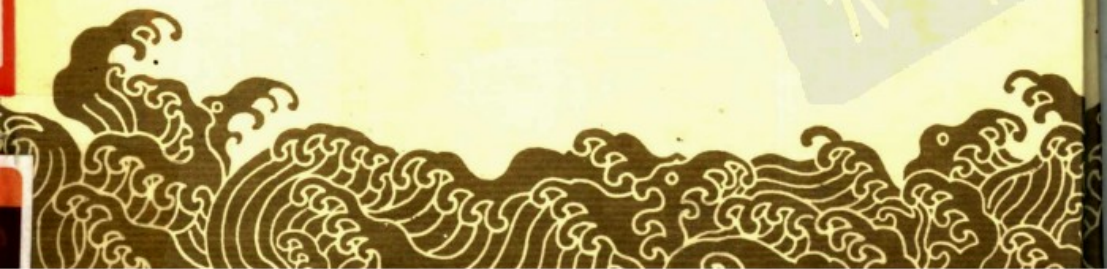


淮系集团与近代中国

淮系人物列传

——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

马昌华 主编



本书为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淮系集团与近代中国

淮系人物列传

——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

马昌华 主编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石 松

封面设计:牛 昕

淮系人物列传
——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
马昌华 主编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字数:310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

ISBN7—80630—011—2/K·7

定价:29.60 元

前 言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变动最激烈、色彩最斑斓的,要数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社会。随着天朝自大的迷梦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整个19世纪下半叶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型的时代。在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并进而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各种矛盾错综交织,而当时各个阶层、各种身分的中国人,纷纷提出各种说法和主张,试图寻找出强国富民的济世良方。在这样一种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中,在这样一座风云际会、思潮激荡的大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集团政治的兴起,并且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而显得异常活跃。

在近代各种社会集团和派别力量的纽结组合中,实力最强又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和以蒋介石为首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集团,它们前后踵接,影响和把持近代中国政局几达一个世纪。与这四大集团并存的,还有其它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团和派别。这些集团派别之间的争斗制衡、升沉起落,亦即集团政治的运作,构成了中国在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基本政治格局。

近代集团政治和封建社会朋党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朋党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派别,大体由官僚、宗藩、外戚、宦官、后妃以及士子等不同类型的人组成,它是封建专制社会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权力斗争的产物,并和作为这种专制统治基础的宗法血缘制度有着割不断的天然联系。可以说,在封建时代,除了极少数官僚士大夫出于政治的目的结为朋党,绝大部分朋党均非因施政方略不同形成派别,而只是为了求得荣华富贵才抱成一团的,即所谓“朋比为奸”,“结党营私”。因此,历代史家大都对朋党现象嗤之以鼻,提倡和标榜“君子群而不党”。而人们时常议论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门户之见、拉帮结派等社会弊病,也确实和朋党政治有着不解之缘。

近代出现的各种政治集团,一方面在集团成员的地域、血缘和门户等特征上,沿袭了封建朋党的传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变迁和潮流的推进,它们在政治目标、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等各方面,又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朋党的鲜明时代特征。

首先,近代集团政治是中国近代社会两大基本矛盾的产物。正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对立,使得中国社会很快分化出一个个利益目标各不相同的阶层或群体,为大规模政治集团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而对这些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矛盾斗争夹缝中生长起来的政治集团来说,攫取权力只是维护其生存发展的手段,并不能仅仅着眼于权力本身。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历史人物的动机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目标,都只能从其所处的时代潮流中产生。在当时落后挨打、苦难屈辱的对外关系现实中,救亡图存已经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中心任务。面临着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即便是统治阶级中最为保守的集团,也会喊出自强应变、御侮图强的口号;何况这些集团在各自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他们的领袖不管出自何种目的和动机,都或多或少想要有一番革故鼎新的作为。因此,追逐权力但又不满足于权力,而是在权力的基础上提出较为明晰的政治要求和变革社会的行动纲领,这是近代集团政治区别于传统朋党政治的一大特征。

其次,近代集团政治还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产物。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除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新与旧、中与西、进步与保守、文明与野蛮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也交织其中。围绕要不要在中国实行近代化、以及如何迅速有效地实行近代化?近代中国思潮迭起,派别纷立。某些利益要求和思想见解相同或相近的人聚合成群体,侈谈时务、议论朝政,他们奉一个或数个有影响的实力人物作为本群体的领袖,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按照本群体的施政方针进行局部的变动或改革,这就是近代集团政治的雏型。与西方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相比,这些集团的成员间除了利益一致和思想观念上的认同感外,缺乏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制度规范;其群体的凝聚力主要视领袖人物权势的涨落而增强或削弱;对成员的进出离合,也没有过多的约束。因此,不难看出,近代的政治集团,是由中国传统政治向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过渡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反映出在新旧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在随之发生相应的调整。

如再细加考察,还可以看出,曾、李、袁、蒋四大集团交替递进的过程,也正是集团政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逐步成熟的过程。如果说晚清湘、淮集团的崛起,标志着封建末世中央专制皇权的衰落;那么,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集团的纽结,则表明带有浓厚封建性和殖民地气息的资产阶级政党形式终于在中国嫁接而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些集团及其领袖对外屈辱妥协的色彩也在不断加重,并由此而造成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负面效应不断增大。

基于上述情形,我们认为,近代集团政治的运作及其展显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政治领域本身。

因此,对于集团政治的研究,也应该从更宽泛的领域、更新的方法和角度以及更高层次的定位上来展开。这套《淮系集团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就是我们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淮系集团与近代中国”课题的基础上,组织本中心专职和兼职人员撰写而成,旨在通过对在近代集团政治运作中颇具典型特征的淮系集团的历史考察,透析政治集团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动时期的作用和地位,从而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

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在19世纪60年代末,曾以令中外瞩目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是继曾国藩湘系集团后,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二个由地方辐射全国的大政治集团,其首脑人物李鸿章,自1862年率淮军入沪任江苏巡抚起,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后逝世,在近代政坛整整活动了四十年;尤其在从天津教案到甲午战争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要职,成为清廷高层参与、影响和执行决策的关键人物之一。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经他直接指挥和参与的军事行动,有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在经济建设上,李鸿章是洋务——近代化运动最积极的推进者,在中国近代化起步阶段的诸项事业中,李鸿章创办最多,成效也最大。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他一人就创办了三个: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另一个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和沈葆楨合办的);另外,他还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漠河金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在外交上,从19世纪70年代起,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经办了一系列重大对外交涉:天津教案、琉球事件、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经他参与和出面签订的。正是由于他这种执晚清外交牛耳的地位,使得当时外国人的眼中,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同样,也正是由于李鸿章处在中西交汇、新旧交替的各种矛盾和漩涡的中心,他和以他为首的淮系集团,才会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李鸿章个人来看,其活动的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所做的事情如此之多,涉及的领域又如此之广,单凭他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晚清官场派系林立,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要在风波险恶、政敌如云的仕途上站稳脚跟并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建立起一个抱成团的强大关系网也是万万不行的。出身翰林遍投名师而又投笔从戎、以军旅起家的李鸿章,深谙其中真谛。因此,从他组建淮军并掌握江苏地方政权之始,就注意在乡邻、师友、门生、部将和亲族中网罗骨干;此后随着个人权势地位的不断升腾,他又左提右挈,拼命发展自己的实力,终于组成一个包括将领、官员和幕僚三个子系统在内的庞

大的淮系集团。

军队，是淮系集团赖以生存的支柱。淮系集团的军事系统，主要由淮军和北洋水师两大武装组成，在当时国内各种类型的军事组织中，它们分别代表着陆、海军最先进的水平，其兴衰存亡也和整个集团的命运息息相关。淮军在“平吴”中崛起，在“剿捻”中壮大并形成独立的军系，为淮系骨干分子从军界向政界和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其它领域伸张势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源源不绝的后备力量；北洋水师的创建，标志着这一集团在晚清国防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甲午战争中淮军的惨败和北洋水师的覆灭，则导致淮系集团的一蹶不振并最终走向衰败。

官员，是淮系集团得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执行各项施政举措的骨干队伍；而那些出任封疆大吏和中枢要职的淮系高官，更能和李鸿章呼应默契，形成一股能影响和左右朝局的政治力量。因此，官员系统的健全发达与否，对淮系集团的运转，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官员数量的多寡、职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该集团实力的强弱。淮系官员的来源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从将领中擢拔；二是从幕僚中遴选保荐；三是在声气相投的同僚和师友中访求。与湘系将领相比，淮系将领总体文化素质和功名出身均大为逊色，因而由武途荐升至文职封疆者屈指可数。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李鸿章特别注意从后两类人员中选拔干吏，由此造成淮系官僚的地域特色远不如湘系浓厚。

幕僚，是淮系集团中极为活跃、最有生气而其成份又十分复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传统的幕僚政治中，幕僚——入幕之宾只是各级官吏亦即幕主私人助手，它本身也只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一种有效补充。而近代幕僚，既是各级官吏预备队，又是社会变革时期各种新领域、新事业所亟需的专业人才库。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所引起的强烈社会震荡，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大为抬头，传统的官吏任免已无法适应督抚在地方施政的需要，故扩充幕府和强化幕僚的作用，成为晚清各集团实力派大员所趋奉的时尚；另一方面，伴随着近代化而产生的社会多样化，又使近代幕僚的角色和职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从传统策士和参谋的身份中解脱出来，广泛地活动于一切能够发挥其能量的领域和部门，或办实业、或搞外交、或兴教育，……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着各种或隐或显不容忽视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近代政治集团的兴盛与发展，与它能否拥有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讲究办事效率的幕僚人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淮系集团，由于它的变局观、趋新精神、开放意识及其所从事的洋务——近代化活动带来的功利效应，比同期其他集团和派别都显得稍胜一筹，从而吸引了形形色色的才智之士，聚合在淮系的幕僚班底中。与湘系幕府重视出身和品行的特点相比，淮系幕府更注重人才的干练与实用，尤其是注意吸收精

通西学的洋务人才。就幕僚的成分而言,文人墨客、绅商买办,一直到来自海外的洋教练、洋技师,只要有一技之长,李鸿章一概予以囊括,收为己用。其中,既包含一大批立志社会进步与变革、想在历史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进步人士;也不乏狗苟蝇营的趋利之徒。对此,李鸿章曾有一句名言:“但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这一来,势必给这个原本已很庞大的幕僚系统造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况。但不管怎样,淮系集团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能够荟聚和网罗近代各种人才的幕僚系统,才使得整个淮系集团相比同时期其它社会集团,更为活跃、更具生命力。

以往的相关研究,大致循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以李鸿章个人的活动为主线,出版了数量颇丰的传记和专论;二是从淮军历史的线索来着手,对军事以外的其它方面则涉猎不足。还有一些是将李鸿章和淮系成员的活动,孤立地放入各个历史时期、各项历史事件中进行个案研究,缺乏从整体上对淮系集团进行系统有机的研究和分析。随着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对晚清以来各种社会集团、派别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和兴趣。本套丛书的编写,就是力图从淮系集团组织网络的方方面面,采用系统、科学、全面的视角和方法,对该集团进行深入的认识和剖析。在课题设计和操作的过程中,我们觉得需要对以下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作简要的说明:

一、关于淮系集团的性质及其成员的界定,如前所述,本丛书所要讨论的淮系集团,是一个以李鸿章为首,包括军事将领、官员和幕僚三大部分成员组成的全国性政治集团,这些成员,就其地域性来说,以两淮地区为主体,但又远远超出两淮地区,可以说,凡是与李鸿章以及其他淮系要员关系密切、声气相投,受其荐举或在淮系各个领域和部门供职的人,都可视为淮系的成员。在晚清,就其活动的时间和规模而言,淮系集团是仅次于清廷中枢集团的一股政治势力。本丛书是以那些对淮系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骨干成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二、关于淮系集团形成、发展和衰亡的时间,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根据我们的研究,淮系集团大致萌芽于淮军初创时期,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并在洋务运动的高峰期达到鼎盛,甲午战争后开始衰落,到1901年李鸿章逝世后宣告瓦解,其地位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所取代。在这里应该指出,淮系集团是从军事性的淮军军系逐步发展、演变,而形成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集团。淮军军系的形成,大约可划在“剿捻”后期,正如团练阶段是淮军的准备阶段一样,淮军军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可说是淮系集团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而淮系集团开始形成的明确时间界线,当以1870年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为标志,主要理由有三:第一,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

6 淮系人物列传

后,开始直接参与清政府的最高决策,他对清政府内政外交所拥有的发言权和处置权,他所活动和施以影响的领域,都是此前不可比拟的。第二,经过多年的经营,在指挥淮军、创设军工企业、抚苏督鄂等活动中,李鸿章已初步在各地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络,部分淮军将领和幕僚已取得了地方行政大权。随着李鸿章擢升直督,这些尚属区域性的关系网络,在发展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开始集结为更能影响清政府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活动的集团力量。第三,自19世纪70年代起,随着清政府固有军事力量严重不足,而海防建设问题日益紧迫这一局面的发展,淮军逐步由勇营转为国防军。再要指出的是,淮系集团的兴衰与其首脑人物李鸿章个人命运密切相关,人存政存,人亡政息。这又反映出转型时期的集团政治,在其运作过程中仍带有较强烈的封建人身依附性。

三、关于淮系集团的历史作用及其评价。在淮系集团活动的历史范畴内,近代中国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时,向西方学习、实行近代化的问题。应该承认,在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上,李鸿章和他率领的淮系集团,曾经迈出过大胆的步伐,进行过各种方式的改革尝试,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自身的思想束缚,他们所开展的洋务——近代化运动没有取得预期成效,从而使得中国在面临世界近代化潮流的挑战面前,痛失一次机遇。今天,我们仍然面临迎接现代化的机遇和挑战问题。如何抓住机遇,急起直追,回顾一个半世纪以前淮系集团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适时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宗旨所在。

本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黄山书社的大力支持,列入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责任编辑石松先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致深深的谢意。由于资料搜集的困难和学术功力的限制,在首批成书的这几部著作中,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此恳请方家教正。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

1995年12月

目 录

一、李鸿章家族成员

情况说明.....	(1)
李鸿章.....	(3)
李瀚章	(22)
李鹤章	(32)
李蕴章、李凤章.....	(41)
李昭庆	(43)
李经方	(47)
李经羲	(52)
张佩纶	(55)
孙宝瑄	(58)
张士珩	(60)
李鸿章家族成员表	(63)

二、武 职

1. 亲军系统

沿革与说明	(97)
韩正国.....	(100)
李 胜.....	(102)
黄中元.....	(104)
罗荣光.....	(106)
周兴隆.....	(109)

2. 开字营系统

沿革与说明.....	(111)
------------	-------

2 淮系人物列传

程学启	(113)
王永胜	(120)
陈忠德	(123)
何安泰	(124)
吴毓芬	(125)
吴毓兰	(128)
吴育仁	(131)
刘士奇	(132)
张家瑜	(135)
谭正武	(138)
沈宏富	(140)

3. 铭军系统

沿革与说明	(145)
刘铭传	(149)
刘盛藻	(163)
唐殿魁	(166)
唐定奎	(169)
刘盛休	(173)
骆国忠	(176)
徐邦道	(179)
王有宏	(181)
姜桂题	(183)

4. 鼎军系统

沿革与说明	(185)
潘鼎新	(187)
潘鼎立	(194)
丁寿昌	(197)

吴秉权	(199)
5. 良(庆)军系统	
沿革与说明	(202)
刘秉璋	(204)
吴长庆	(213)
曹德庆	(219)
叶志超	(221)
6. 松军、武毅军系统	
沿革与说明	(226)
郭松林	(228)
李长乐	(232)
谢连陞	(235)
聂士成	(237)
胡良作	(247)
何永盛	(250)
杨玉书	(253)
7. 勋军系统	
沿革与说明	(254)
杨鼎勋	(255)
段 喆	(257)
8. 树军系统	
沿革与说明	(259)
张树声	(261)
张树珊	(268)
张树屏	(271)
滕嗣林	(273)

滕嗣武·····	(275)
9. 盛军系统	
沿革与说明·····	(277)
周盛波·····	(279)
周盛传·····	(283)
卫汝贵·····	(290)
10. 其 它	
情况说明·····	(295)
张遇春·····	(296)
李济元·····	(298)
黄翼升·····	(300)
李朝斌·····	(302)
欧阳利见·····	(303)
陈东友·····	(304)
曹仁美·····	(305)
吴建瀛·····	(307)
唐仁廉·····	(309)
周有才·····	(311)
董全胜·····	(313)
郑国魁·····	(315)
郑国俊·····	(323)
郑国榜·····	(325)
马复震·····	(327)
马玉崑·····	(330)
淮系集团武职人员表 ·····	(333)
后 记 ·····	(390)

一、李鸿章家族成员

情况说明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战乱自江西湖口迁合肥。延至许迎溪，娶同村李氏为妻。妻弟李心庄膝下无子，许迎溪夫妇以其次子慎所过继为嗣，改为李姓。自李心庄起，经慎所、君辅、汉昇、士俊、凤益、庆庵、文安，到李鸿章已经是第九代了。

李家世代以耕读为业，“无人与于科目之列”。李鸿章祖父李殿华两应乡试不第，遂绝意进取，以课子孙耕读，足不入城五十余年。直至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合肥李氏“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文安，字式和，号玉泉(川)，别号愚荃，道光十四年(1834)中举，四年后中进士，官刑部郎中，娶合肥处士李洪谟(字腾霄)之女为妻，共生六子二女，即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益妹(?)、李玉娥。

李鸿章创立淮军之初，大多利用家族、师生、同里、乡谊等关系。在其家族成员中，长兄李瀚章自同治元年起在广东办理厘金，淮军械弹，多由其购置；出任湖广总督后，为淮军筹粮筹饷，成为李鸿章坚定的臂助与奥援。三弟鹤章、六弟昭庆均加入淮军，分别为亲兵营统领与忠朴营统领，官至甘凉道、盐运使。四弟蕴章、五弟凤章也曾入李鸿章官署任职。同治年间，李鸿章在苏南用兵孔急，其大妹夫张绍棠率部前往，后加入亲兵营，官至记名提督。二妹夫费日启也于同治年间参加淮军幕府，保升至江苏候补知府。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外甥张席珍、张士瑜、张士珩等皆先后加入淮军幕

府,随李鸿章任事。在淮系集团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李氏家族成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李鸿章家族成员表”,主要依据李经方编修的《李氏宗谱》(民国十四年排印本)辑录,根据李氏家族成员在淮系集团中的作用与影响,故自章字辈始,排至国字辈止(按:嘉庆年间首次纂修《李氏宗谱》时,定下“文章经国,家道永昌,福寿承恩,勋荣世守”十六字辈)。

李 鸿 章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铜,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县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为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鸿章高祖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1]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2]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乡以课馆为业。李鸿章6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又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昉等皖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

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亦即 1845~1846 年),即以“年家子”身分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这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3]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燊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4]于是李鸿章随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其父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5]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十月率团